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杜甫诗选

莫砺锋 童强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始于1897

古代詩詞典藏本

袁行霈題

主 編 袁行霈

副主編 劉躍進

杜甫詩選

莫斫鋒 童強◆撰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诗选/莫砺锋,童强撰.—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古代诗词典藏本)

ISBN 978-7-100-15802-2

I.①杜… II.①莫…②童… III.①杜诗—诗集
IV.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67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杜甫诗选

(古代诗词典藏本)

莫砺锋 童强 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802-2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frac{3}{4}$

定价:39.00 元

走出学术象牙塔

刘跃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

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广大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启示之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康德《逻辑学讲义·导论》说过：“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

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提高在前，普及在后。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古

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

品选本。

丛书付梓在即，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种信任让我感动。确实，好书好序，相得益彰。如果翻开一部新书，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就好像刚出门，便遇上障碍物，诚可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叫人眉蹙。顾炎武《日知录》早就告诫：“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贸然作序，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我想，好书确实需要介绍，好意也要有所表达。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2014年5月30日

草于京城爱吾庐

导 言

一

杜甫，字子美。曾居长安城南之少陵，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唐睿宗延和元年（712）生于河南巩县，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湖南的湘江之上。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令。青年时代的杜甫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曾漫游吴越，也曾放荡齐赵。虽然他二十四岁时曾应试落第，但这个挫折并未影响其情绪。他乐观潇洒，对人生充满信心，他期盼着攀登绝顶、俯视群山的一天，就像在《望岳》诗中所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次年，唐玄宗诏天下凡通一艺以上者皆赴京师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可是奸相李林甫嫉贤害能，玩弄阴谋使应试者全部落第，并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望就这样被断送了。无奈之下，他多次向达官贵人献诗，又

向朝廷献赋，希望得到赏识，然皆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其父杜闲去世以后，杜甫的生活日益困顿，靠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勉强度日。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被任命为河西县尉。杜甫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个从八品下的小官。他得官后即往奉先县探看寄养在那里的妻儿，此时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了！

安史叛军不久就攻陷洛阳，逼近潼关。杜甫带着家人混杂在难民群中仓皇逃难。天宝十五载（756），杜甫把家人安顿在鄜州的羌村，便只身前往灵武，去投奔刚在那里登基的唐肃宗。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往沦陷的长安。次年春，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官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归朝廷临时所在地凤翔。朝廷念其忠诚，授予左拾遗之职。当年年底，杜甫随朝廷返回长安。因性格忠鲠，直言进谏，杜甫触怒了肃宗，在凤翔时已被疏远，回到长安后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元年（758）关中大饥，杜甫乃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稍后又南逃至成都，从此在“成都草堂”里一住五年。成都虽然远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但地近边陲，边警不断，地方军阀的叛乱、割据时有发生。宝应元年（762），杜甫因徐知道之乱而流寓绵州（今四川绵阳）、梓州（今四川三台），至广德二年（764）又往阆州（今四川阆中），然后返回成都。次年，对杜甫照顾颇周的成都尹严武去世，杜甫随即携家出蜀。他不胜感慨地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

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

离蜀以后，杜甫先是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稍作盘桓，然后沿长江东下，经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等地，至云安（今重庆云阳）因病留滞半年，于永泰二年（766）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他在夔州得到都督柏茂琳的照应，在白帝城下居住了两年。杜甫在夔州生活得较为安定，但毕竟是寄人篱下，正如南宋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所说：“如九尺丈夫俯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此时的杜甫老病交加，眼看着旧交凋零，国家的复兴却遥遥无期，心中百感交集，写了大量回忆往事的诗。

大历三年（768），杜甫离开夔州，出峡东下。抵达江陵（今湖北江陵）后逗留了半年，又移居公安（今湖北公安），岁末到达岳阳（今湖南岳阳）。次年，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先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复往衡州（今湖南衡阳），全家一直生活在一叶扁舟之中。大历五年（770）夏，杜甫欲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投靠亲戚，舟至耒阳（今湖南耒阳），遇阻于江水暴涨，五日不得食，后得耒阳的聂令送来酒肉，方免饿死。因阻水无法南行，乃回棹北归。入冬，杜甫病倒在湘江上的一叶孤舟中，弥留之际作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对疮痍满目的人间表达了最后的哀痛：“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因家贫无力归葬，杜甫的灵柩旅殡于岳阳，四十余年

后才由其孙杜嗣业归葬故乡偃师的首阳山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本是杜甫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鸣，却竟然成为李、杜二人的共同命运的确切写照。

杜甫的一生，适逢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代，也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唐玄宗统治的前期，即开元年间，一共二十九年。那时的唐玄宗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贤臣的辅弼，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也就是天宝年间，一共十五年。早从开元末年开开始，唐玄宗逐渐萌发了骄侈淫逸之心，贪图享受，不理国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乘机弄权，政治日趋黑暗，国势逐渐衰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直到八年之后，安史之乱才算基本平定，但是大唐帝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这两个时期总长约五十年，与杜甫的生活年代基本重合。杜甫在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亲眼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并始终希望实现这个理想。杜甫成年以后，目睹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大动乱。所以他对当时社会种种不合理的弊端看得更为清楚，并能写出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写实诗歌。优秀的诗人都是社会的晴雨表，他们能比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急风骤雨在杜甫心头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杜诗中充满了哀伤愤怨、激昂慷慨。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其内在本质正是内心抑扬起伏的情感波澜。古语说：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用这句话来解释杜甫与其时代的关系，最为确切。

杜甫的一生，在诗歌史上适逢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代。人们公认天宝末年是唐诗的转折点，其前为盛唐，其后为中唐。清人叶燮和今人闻一多甚至认为天宝末年也是整个古典诗歌史的一个分水岭。天宝末年杜甫四十五岁，几乎就是他三十年诗歌创作生涯的中点。杜甫上与李白等人同属盛唐诗人群体，下为元白等中唐诗人的先驱。从汉魏六朝到盛唐，诗歌创作的实绩已有丰富的积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杜甫在此时崛起于诗坛，以集大成的姿态对前代诗人留下的遗产进行全面的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杜甫在题材内容上为唐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他几乎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所有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并与自身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所以被明人胡应麟评为“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诗薮》内编卷四）。如果说盛唐诗歌以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为主，那么杜甫的诗开始转向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也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所以从整个唐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正是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宋人颂扬杜甫是诗史上的“集大成者”（秦观《韩愈论》），集大成的意义既在于总结前代，也在于开启后代。

总之，杜甫所处的时代在政治史和文学史两个维度上

都是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呼唤伟大诗人的时代，杜甫就是应运而生的伟大诗人。

二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他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物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

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的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的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的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

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穡，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对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天下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起来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

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吃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

三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两个高潮，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那么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有，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则付诸行动，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儒学的内涵。从本质上说，儒学原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所谓的百姓日